

# 从民族国家到全球秩序：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政治图景

封 帅

**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跃迁及其所引发的科技革命将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它不仅对现存的各种政治制度构成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且随着其影响力的不断释放，人工智能技术将逐渐改变主权国家结构中的各种关键要素，通过引入新要素与创建新维度为世界政治的形态更替开拓新空间。从人工智能技术参与政治活动开始，世界大体上将经历四个阶段的政治形态演变。经过低度智能化社会的过渡之后，世界政治体系将在中度智能化社会阶段逐步超越人类对于政治概念的认知。理性的人类社会在选择政治形态时需要以至高的人类精神为底线，因此，以无政府状态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为特征的技术极权主义模式将是系统演进中具有重大风险的歧路。在人工智能技术水平与人类社会的思想认知较为成熟之后，在算法封建主义与智能化世界政府两种情境之间能够形成较为稳定的世界政治形态。人工智能技术跃迁将会重新定义世界政治的范畴与内涵，推动我们所处的世界走向新的全球秩序。

**关键词** 人工智能 世界政治 技术极权主义 算法封建主义 智能化世界政府 民族国家 全球秩序

---

\* 封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青年研究员（上海200233）。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8CGJ013）的阶段成果。笔者曾于2019年10月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对本文部分观点作过介绍。陈志瑞教授对本课题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笔者也就本文相关内容与研究团队成员刘树才、王玉柱、周亦奇进行过深入讨论，在此一并致谢！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 引 论

任何能够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科技变革必然会将它的力量映射在政治层面，科技不仅能够改变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方式，而且会塑造世界政治的新形态。人类所有关于政治的理念、价值、制度设计与行为准则，本质上都是在特定的科技与经济条件下对具有合理性的社会分工与权力分配方式的概括，这些抽象理念与具体安排共同构成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共同体，从而形成了世界政治的基础。现代世界的政治形态源于被工业革命所塑造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被民族等现代概念重新整合的主权国家作为政治活动的核心主体，已经成为全球人民共同的集体记忆与寄托特定人群历史情感的唯一平台，而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主权国家体系则成为当代世界历史的宏观背景。<sup>①</sup>

然而，科技进步从来不会停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很可能已经身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sup>②</sup>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新一轮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将对世界政治的结构与形态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由于技术发展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而社会结构则具有惯性稳定的特征，这一复杂而深刻的变革进程会在多长时间才能展现其全貌，目前我们尚难定论，但这种历史性进程可能带来的冲突与风险却需要国际关系研究者给予充分的重视。对于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态来说，所有基于学理的研究与建构都有可能特定时刻对历史进程产生微妙的引导和影响。我们今天写在纸上的思想火花，或许就是未来某些传奇的开端。

---

<sup>①</sup> 关于国际社会中的政治行为体演变进程，可参考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orld History: Remar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sup>②</sup> 技术层面的信息，可参考 Geoffrey E. Hinton, Simon Osindero and Yee-Whye Teh, “A Fast Learning Algorithm for Deep Belief Nets”, *Neural Computation*, Vol 18, No 7, July 2006, pp 1527-1554; Pedro Domingos, *The Master Algorithm: How the Quest for the Ultimate Learning Machine Will Remake Our World*, Basic Books, 2015; Yoshua Bengio, Pascal Lamblin, Dan Popovici, Hugo Larochelle and Greedy LayerWise, “Training of Deep Networks”, in J. Platt et al, eds,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NIPS 2006)*, MIT Press, 2007, pp 153-160; Marc’Aurelio Ranzato, Christopher Poultney, Sumit Chopra and Yann LeCun, “Efficient Learning of Sparse Representations with an Energy-Based Model”, in J. Platt et al, eds,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NIPS 2006)*, pp 1137-1144。

本文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初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主权国家的深层次结构会发生怎样的演进，在此基础上世界政治又将呈现出怎样的新图景。本文的讨论将按照由单元到体系的顺序在两个层次上分别展开：其一，人工智能要素的影响首先作用于现有的政治共同体，技术变革会迫使主权国家的内部结构出现调整；其二，政治共同体内部的结构变迁会改变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方式与系统运行逻辑，从而实现体系层次的形态演变。这个从点到面的过程也是人工智能要素的影响在世界政治系统中传导和建构的过程，两个层次相互影响、相互建构，最终形成新的全球秩序。由于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其结果必然是开放的，未来的世界政治将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演进图景。

从全球范围来看，广义上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从2017年开始出现，早期研究主要由美国学者推进，大多聚焦于人工智能对于西方国家现行政治体制的冲击，很多成果学理扎实、逻辑严密。<sup>①</sup>然而，西方学者大多受其国内社会“政治正确”因素的干扰，在研究上出现了明显的“逻辑失序”现象。他们大多将当前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视为唯一合理的政治制度，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对政治生态的影响以不改变现有体制为“红线”。这种人为设限不仅会影响其研究向更多未知领域拓展，而且很可能造成结论偏差。<sup>②</sup>在中文学界，从2018年起，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领域，对人工智能相关议题的研究渐成显学，部分成果涉及新科技与国家、社会的互动关

---

<sup>①</sup> 近年来西方学者关于人工智能与政治体制的相关研究，参见 Dirk Helbing, Bruno S. Frey, Gerd Gigerenzer, Ernst Hafen, Michael Hagner, Yvonne Hofstetter, Jeroen van den Hoven, Roberto V. Zicari and Andrej Zwitter, “Will Democracy Survive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cientific American*, February 25, 2017,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will-democracy-survive-big-data-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 Greg Allen and Taniel Ch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ctivity (IARPA)”, Belfer Center, Harvard Kennedy School, July 2017; Hamid Akın Ünv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Systems”, *Cyber Governance and Digital Democracy Report*, Center for Economics and Foreign Policy Studies (EDAM), 2018; Mathias Risse, “Human Right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 Urgently Needed Agenda”, Harvard Kennedy School CARR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Policy Report, May 2018; Daniel Aray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End of Government”, *Forbes*, January 4, 2019, <https://www.forbes.com/sites/danielaraya/2019/01/04/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the-end-of-government/#50f2bbfc719b>.

<sup>②</sup> 目前英语世界对于该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将立足点确定为讨论如何在人工智能技术跃迁的情况下继续延续西方现有的政治制度，很少进一步讨论制度深度变革的可能性。参见 Dirk Helbing et al., “Will Democracy Survive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mid Akın Ünv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Systems”。

系，对未来世界政治的展望也有提及。<sup>①</sup>王绍光教授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新技术革命很可能彻底颠覆现有的国家理论”<sup>②</sup>。但总体而言，大部分相关研究尚处于早期探索阶段，目前尚未出现直接讨论人工智能对主权国家形态影响的研究成果。

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本文所做的是一项立足当下、属意未来的研究。我们的讨论以主权国家结构与现代世界体系为起点，但其内容和最终立足点无疑将会超出当代政治的范畴。本文会涉及某些基本概念和基础逻辑的调整，具有明显的前瞻性特征。另一方面，本文所有论证的前提是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持续取得进步，但笔者深知技术进步绝不可能是一个线性过程，囿于主题与篇幅的限制，对于技术发展本身的循环上升逻辑不再详述，只讨论在限定条件下的可能影响。<sup>③</sup>笔者也希望本文能够引发讨论和批评，将国际关系视域中的人工智能研究进一步推向学理化的轨道。

## 一、既有研究进展及其缺陷

在深度学习初步展现出巨大潜能之后，关于人工智能技术所将带来的社会影响迅速成为各国政府部门、学者、媒体讨论的热点。几乎所有政治科学研究者都意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进步将对全球现存政治制度及国家间互动产生影响，如果这种潜力像预期的一样充分释放，那么其力量将不断冲击现存世界政治架构。它与国际关系的现实交集已经出现，主要表现为开始

---

<sup>①</sup> 2018年以来，中国学者围绕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的相关主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部分涉及本文主题。参见傅莹：《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析》，《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1期，第1—18页；王绍光：《新技术革命与国家理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第93—100页；任剑涛：《人工智能与社会控制》，《人文杂志》，2020年第1期，第33—44页；严行健：《人工智能时代的代议制：挑战、机遇与发展路径》，《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2期，第76—84页；叶娟丽、徐琴：《去中心化与集中化：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悖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12页；高奇琦：《人工智能：驯服赛维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陈定定、朱启超主编：《人工智能与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笔者部分文章对本文主题也有所涉及，参见封帅：《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外交评论》，2018年第1期，第128—156页；封帅、周亦奇：《人工智能时代战略行为的模式变迁——走向数据与算法的竞争》，《国际展望》，2018年第4期，第34—59页。

<sup>②</sup> 王绍光：《新技术革命与国家理论》，第93页。

<sup>③</sup> 事实上，对于人工智能技术能否实现持续稳定发展，学术界存在一定争议。悲观论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存在较为明确的极限。参见吴军2019年11月9日在上海的演讲。吴军：《人工智能的极限》，虎嗅网，2019年12月22日，<https://www.huxiu.com/article/332343.html>。

对部分既有政治制度和政治运作产生影响，在军事和其他关键领域也有个别案例。当前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对于该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新技术对于政治体制的影响展开。

2017年2月，著名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出版特刊，题为“民主会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中生存下来吗？”<sup>①</sup>从此揭开了人工智能与政治制度相互关系问题讨论的序幕。在这一时间点，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的认知还相当有限，在全球范围内也尚未发掘出与此主题相关的明确案例。然而，敏锐的观察者们已经感受到深层次变革的蛛丝马迹，特别是在全球社交媒体庞大的信息流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人们心里的欲望与恐惧，让很多政治活动出现了明显的非理性偏转。

这些知识精英的担心很快便被证实了。在2018年“剑桥分析”事件爆发之后，几乎整个世界都直接感受到了人工智能技术与西方政治体制的内在张力。<sup>②</sup>这种难以调和的不匹配状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进步变得越来越强烈，网络和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人工智能及其衍生技术彰显影响力的前沿阵地。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渗透，社交媒体的生态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庞大无序的信息流在技术的引流和切割下被分解为碎片化的信息，并定向投送给目标人群，从而形成了一个“信息茧房”，在虚拟空间中创造了新的社会圈层。<sup>③</sup>这种状态具有深刻的经济根源，也很快在政治生活中展现出强大的力量。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美国总统大选俨然已成为一场全球参与的政治运动，各种政治力量都利用社交媒体展开博弈，而算法就是这场博弈的武器。当然，人工智能的政治影响还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国际社交媒体上各种关于疫情的谣言在很多无形力量的推动下高速传播，这些谣言常常具有明确的政治性目标，而人工智能技术的信息定向分发就是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

事实上，社交媒体及所有互联网信息传播平台都是人工智能技术影响政治生活的重要媒介，目前已被披露的以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社会群体政治选择的现象只是冰山一角。“剑桥分析”事件明确展现了这股潜藏在网络背后的

---

① Dirk Helbing et al., “Will Democracy Survive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② 关于“剑桥分析”事件的情况，可参考 Danielle Wiener-Bronner, “Your Guide to Cambridge Analytica”, CNN, March 21, 2018, <https://money.cnn.com/2018/03/20/technology/what-is-cambridge-analytica>.

③ 参见 Cass R. Sunstein, *Infotopia: 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政治力量，但它显然不是世界上唯一从事这类营生的实体，大量类似机构仍然以各种形式活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那些真正掌控海量数据并拥有强大算法的平台型企业——特别是搜索引擎与社交媒体的掌控者，以及拥有类似力量的政治团体才是这场博弈的大玩家，他们已经具有将所掌握的技术力量转化为政治影响的可能。<sup>①</sup>可以说，在人工智能的经济潜能尚未充分释放的情况下，它对政治活动的直接影响已经逐渐显现。<sup>②</sup>在此背景下，各国研究者也不得不认真分析和回应人工智能技术对政治领域的冲击，既有研究大体上从以下三个方向展开。

第一，“说服算法”将动摇理性选择假设与代议制民主的基础。

代议制民主的逻辑起点是抽象的理性人假设，即每个抽象的个体都能够自由且理性地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判断和选择，并且自觉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因此，由理性个体组成的共同体可以实现有效的利益均衡，从而构成代议制民主体制的理论基础，也是现代西方民主体制合理性的根基。<sup>③</sup>

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说服算法”（persuasive algorithms）的广泛应用，使得理查德·塞勒提出的“助推”（nudging）效应得到了充分的释放。<sup>④</sup>通过隐蔽的数据搜集和不断精确的个人画像，人工智能可以在大数据的条件下为用户提供定制化服务。这种算法应用在政治领域，同样可以分析用户的政治倾向，并有针对性地对其政治态度进行引导，通过间接和隐蔽的方式将其推向预想的结果。整个过程并未诉诸威胁或强制，被“助推”的个体很容易将其视为自己在备选方案中做出了理性选择。其实，他们的选择本身只是人工智能算法所引导的连续行为的自然结果，但他们自己几乎不会注意到这一点。<sup>⑤</sup>

---

<sup>①</sup> 关于平台型企业的讨论，可参考 Julia Carrie Wong, “The Cambridge Analytica Scandal Changed the World-But It Didn’t Change Facebook”, *The Guardian*, March 18,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9/mar/17/the-cambridge-analytica-scandal-changed-the-world-but-it-didnt-change-facebook>.

<sup>②</sup> 事实上，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等其他领域的影响也已经开始显现，如无人机系统独立作战的案例在中东地区已经出现，但尚未接近社交媒体对于政治活动的影响程度，相关问题笔者将另文论述。

<sup>③</sup> 参见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63—388页。

<sup>④</sup> Richard H. Thaler and Cass R. Sunstein,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Penguin Books, 2009.

<sup>⑤</sup> Hamid Akın Ünv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Systems”, p. 8.

人工智能技术借助社交媒体展现政治影响力的最显著结果便是个体理性选择假设在技术的持续冲击下逐渐式微。长此以往，这种趋势将会消解代议制特别是现代西方选举体制的基石，也难怪西方学者会格外关注本议题。

第二，人工智能参与决策过程造成合法性悖论。

作为政治系统最重要的环节，政治决策过程是所有政治活动的核心。在现代政治体系中，在政治决策环节中确保政治参与的实现是一个固定的程序，现有的国际行为体都要以这种方式建构决策的合法性叙事。实际上，政治参与过程是否一定会造成决策的效能提升其实很难统计，但政治参与本质上反映了现代政治体系的内在需求。通过政治参与，各方利益集团加入决策过程中来，复杂的程序以及仪式性活动构成了政治决策的合法性根源。<sup>①</sup>

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使得原本顺理成章的逻辑产生了新的矛盾。从功能性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证明它是提升决策效率与科学性的有效工具。它可以通过积累海量数据和自动文本挖掘等渠道感知民众的普遍情绪与核心诉求，为政策制定提供基础性的依据。同时，它也能够利用特定算法对整个政策过程进行预测和模拟，降低政策成本，优化政策选项。甚至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也能够更好地完成相关的资源配置。<sup>②</sup> 几乎从各个角度看，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都会使政治决策过程获得有效的辅助工具。但问题在于，从技术层面对决策进行优化提升实际上是在降低政治参与的意义，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越大，通过政治参与和动员获得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可能性就越小。但现有的以深度学习和多层神经网络为主要推进路径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存在明显的“黑箱”特点，无法自行解释自己的决策依据，也就无法通过有效沟通建立新的合法性认知。<sup>③</sup>

因此，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中，人工智能技术越成熟，决策效能越高，就越容易诱发对技术的依赖，从而加剧政治参与和动员的缺位，冲击决策的合法性基础。

第三，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使权力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数据和算法成为政治系统中权力的重要组成

---

<sup>①</sup> 有关政治参与对决策合法性的影响，参见西蒙·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sup>②</sup> 对于这种优势的表述，可参考 Joshua Davis, “Hear Me Out: Let’s Elect an AI as President”, *Wired*, May 18, 2017, <https://www.wired.com/2017/05/hear-lets-elect-ai-president/>。

<sup>③</sup> 参见封帅、周亦奇：《人工智能时代战略行为的模式变迁——走向数据与算法的竞争》，第55—57页。

部分。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强对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渗透，无处不在的数据搜集使得独立个体越来越被拆解为数字化的符号，渐趋数字化和透明化的社会环境使得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被卷入一个由技术支撑起来的宏大系统，政府、资本、社会团体甚至每一个独立个体都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这种数字化状态驱动我们的政治与社会活动从有形的地理空间走向无边界的数字空间。现实政治生活的诸多环节为了适应这种形态的转变，迟早会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所支撑的自动化系统，目前在司法、公共关系与社会管理等多个方面都已经在积极尝试。<sup>①</sup>在部分学者看来，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出现，主权国家最为核心的权力基础——“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已经难以延续，这几乎会动摇现代政治理论的基础。<sup>②</sup>

权力的基础是对资源和信息的掌控和占有，但由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高门槛，从算法到数据的存储需要依赖高技术企业或少量科技人员推动。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一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个人恶意与算法偏见，当基础资源的所有权逐渐脱离旧轨，主权国家对于政治权力的掌控也会在技术的不断侵袭下出现松动，权力的边界将变得更加模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逐渐具备形成新权力中心的可能性。<sup>③</sup>即便他们主观上并没有挑战主权国家的意愿与动机，但客观上却在缓慢而稳定地扩大政治权力的模糊地带。

由于迄今尚未得到更加充分的案例支持，各国研究者只能根据既有经验从上述三个方面对该问题展开分析。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些就是人工智能技术与世界政治体系互动关系的全部内容，更多的案例和证据会随着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影响的逐步深入而不断展现在我们面前。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政治影响主要以社交媒体作为中介，其影响力更容易通过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的某些特征反映出来，所以欧美学界的主流话语将讨论重点主要设定为人工智能与西方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受到“政治正确”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讨论难免出现“逻辑失序”现象，也构成了既有问题研究的内

---

<sup>①</sup> 例如，在司法领域，欧洲人权法院采取人工智能系统预测案件结果，准确率达到79%。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与科大讯飞公司合作研发了“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2019年1月，上海二中院首次使用人工智能系统辅助开庭。同年，北京互联网法院在线智慧诉讼服务中心发布了首个人工智能虚拟法官，实现了在线操作的自动化。参见杨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价值与使命》，澎湃新闻，2020年4月2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066841](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066841)。

<sup>②</sup> 王绍光：《新技术革命与国家理论》，第100页。

<sup>③</sup> 参见 Taylor Owen, *Disruptive Power: The Crisis of the State in the Digital 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在缺陷：一方面，西方学者对于该问题的讨论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必须适应现有的西方民主制度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对于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巩固非西方政治制度的现象表达了严重的担忧。<sup>①</sup>

其实，这两种现象都源于同样的逻辑基础，即认定现有西方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最优选择，其他非西方制度都是错误甚至“邪恶”的。因此，关于人工智能技术与政治活动互动关系的讨论，只能在不改变现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将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新要素纳入政治体系。同样，在该逻辑中，任何不利于西方制度的技术进步都是有利于其他非西方制度的，就会构成对国际秩序的威胁。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有目的、有意识地限制人工智能技术的成长速度，以维持旧体制的稳定。因此，建立“可解释的人工智能”，或者创建“技术红线”等举措，是现有讨论的主要基调。<sup>②</sup>

这种设想当然有其自洽的叙事，也会成为未来发展的图景之一。但这种思路本身就存在明显的逻辑问题，它忽视了人类社会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而将建立在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上的社会认知视为政治发展的终点。事实上，“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sup>③</sup>制度、组织与人类政治意识都必须适应特定时代的生产方式与技术特征，要求科技发展去适应现有政治制度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设计。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竞争环境下，所有寄望于技术减速的思路不仅会因为集体行动困境难以付诸实施，而且思想上的画地为牢会严重制约知识体系的拓展。

我们要探索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带来的所有可能的发展，而不是辩护某种制度一定能够在变革时代生存下来。在其形成过程中，所有现存政治制度以及支撑这些制度形态的理念和架构都不可能提前考虑到人工智能等新一代通用目的技术的相关因素，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新变量进入世界政治系统之中，对于系统架构的适应性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只要技术要素所带来的变革动力足够强大，它所能冲击的就不仅是在近代才逐渐稳定下来的诸多制度性安排，也会对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很多基本原则提出挑战。

---

<sup>①</sup> 例如，美国研究者对于中俄等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就会表现出明显的担忧情绪。参见 Nicholas D. Wright, ed., *AI, China, Russia, and the Global Order: Technological, Political, Global, and Creative Perspectives*, A Strategic Multilayer Assessment (SMA) Periodic Publication, December 2018.

<sup>②</sup> 例如，Marianne Lehnis, “Can We Trust AI If We Don’t Know How It Works?” BBC News, June 15, 2018,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44466213>.

<sup>③</sup>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页。

## 二、变革的起点：主权国家的结构特征

我们正处于一个由工业文明的跨洲际流散与主权国家体系的全球扩张所塑造的现代世界，主权国家是构成当前世界政治的基本单元，主权国家体系自然也被研究者视为分析当代世界政治问题的宏观背景。<sup>①</sup>由于人工智能技术跃迁诞生于主权国家体系业已成熟的今天，其影响自然也首先呈现于既有的主权国家结构之中。因此，如果希望更完整、更准确地展现人工智能时代世界政治变革进程的全貌，我们就必须首先对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结构与特征进行剖析，以此作为整个研究的逻辑起点。

作为迄今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政治共同体，主权国家的建构经历了漫长且复杂的历史演进，其核心结构的诸多关键要素在数百年的时间内顺次出现，不断叠加融合，最终在工业化进程的推动下形成了现代世界的基本形态。

主权国家肇始于17世纪中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常常被视为现代国家体系的起点。<sup>②</sup>因此，在很多文献中现代国家体系也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其实，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时，构成当代主权国家基本形态的大多数关键概念，如民族、自由、社会、权利等都还没有完全成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仅通过协议在欧洲部分地区确立了一些具有系统性意义的基础原则。<sup>③</sup>然而，这些看似并不复杂的原则却契合了世界历史前进的轨迹，为现代世界的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随后数百年间，虽然政治行为体的外在形态几经演变，但其核心原则始终没有发生颠覆性变动。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的核心逻辑是：体系内的行为体在确定的有限空间内拥有绝对的排他性主权。<sup>④</sup>该原则将空间的有限性与主权的绝对性结合在一起，使得绝对君主制国家这种统一有力的政治单元在竞争中脱颖而

---

<sup>①</sup> 可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郭方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sup>②</sup> Stephen Krasner, "Westphalia and All That", in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35.

<sup>③</sup> 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意义的理解，参见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Beyond Westphalia? Capitalism After the 'Fal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5, December 1999, pp. 89-104; Stephen Krasner, "Compromising Westphal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3, 1995-1996, pp. 115-151.

<sup>④</sup> 参见 Daniel Philpott, *Revolutions in Sovereign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出。由于获得了在其所属空间内垄断合法使用暴力并调动各种资源的权力，它成为多元竞争环境下最有效的经济与军事工具，在理论和现实中同时解决了欧洲封建时代帝国、教会、城市、行会与君主等多元行为体权力纠缠重叠的混乱局面。<sup>①</sup> 在打破帝国和宗教所带来的世界主义共识之后，一群在法律地位上处于同等位阶的君主制国家在互相承认对方领土与主权的基础上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新的政治体系出现之后，原本由宗教支撑的世界主义的共同信仰在现实中难以为继，绝对君主国需要寻找新的合法性叙事以确保政治共同体的稳定，而这种合法性叙事只能从各自的主权空间内获得，于是对合法性叙事的探索也就构成了国家建构过程。<sup>②</sup>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按照地理空间内的主权至上原则进行划分，因此各国在相对稳定的地理空间内逐渐形成了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与文化纽带。在共同法律体系和集体记忆的推动下，绝对君主国的民众开始形成共同利益的意识，国家逐渐成为所有民众区分“自我”与“他者”的首要标准，抽象的“国家利益”开始成为绝对君主国合法性叙事的基础。<sup>③</sup>

18 世纪下半叶，由于工业革命的出现，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基本方式出现了颠覆式的改变。资本、贸易以及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的劳动者成为构建经济生活的关键要素。新的社会阶层逐渐成型，而政治权力的重心也逐渐由君主转向普遍意义上的民众。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作为民众集体意志和共同利益的抽象表达被赋予了崇高的意义。<sup>④</sup> 民族主义理论叙事的核心优势在于，它以牺牲君主权力的方式，为新兴工业资本与政治权力的深度结合提供了有效途径，能够使新的社会阶层的力量与创造力得到释放。“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sup>⑤</sup> 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欧洲大陆政治共同体形态的剧烈变动，欧洲大陆的革命推动了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在绝对君主国的架构中破茧而出，并且迅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能力。在随后数百年的时间里，主权国家体系

---

<sup>①</sup>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orld History: Remar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44-245.

<sup>②</sup> 关于绝对君主国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参考 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Routledge, 2005, pp. 3-4.

<sup>③</sup> 参见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Blackwell, 1983, pp. 1-5.

<sup>④</sup> 关于民族的起源与民族认同的形成，参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叻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

<sup>⑤</sup>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页。

与工业化进程相互促进，作为欧洲秩序的核心内容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迫使所有其他区域的政治共同体被整合进主权与民族所构成的核心架构之中。<sup>①</sup>现代主权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架构，提供了以民族为核心假设的合法性叙事，并将经济、行政、军事及社会管理等核心权力都集中于该架构之内，从而实现了在特定空间内拥有最高权力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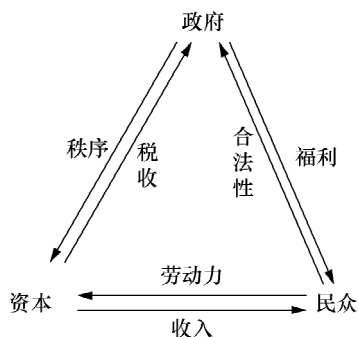


图-1 现代主权国家的内部结构

如图-1所示，历经多轮技术革命的冲击与各种社会思潮的互动，现代主权国家内部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由政府、资本和民众构成的紧密型三边结构。在理论上，这种结构表现为政府通过资本获得税收以及进行国内利益调整和再分配的能力，同时为资本的运作提供有效的秩序保障。而民众通过某种普遍接受的形式为政府提供合法性确认，政府则以有效的福利分配确保民众普遍利益的实现。然而，在现实运行中，系统调节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过程，每个环节的失效都有可能带来政治系统的失能甚至崩溃。一旦政府无法提供有效的社会秩序，资本所带动的经济发展就将衰退，政府也将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为民众提供社会福利，这种状态的极端结果就表现为“失败国家”。<sup>②</sup>而一旦民众不愿为政府提供合法性授权，政府塑造社会秩序的能力就将严重削弱，其外在表现就是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sup>③</sup>因此，为了确保系统既能

① 关于民族主义与欧洲国家建构问题，查尔斯·蒂利有过精彩的论述。参见 Charles Tilly, *The Formation of Nation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② 参见 Robert I. Rotberg, “Failed States in a World of Terror”,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4, July/August 2002; Hans Henrik Holm, “A Disaggregated World Order in the Making: Policy Towards Failed States as an Exampl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8, September 2001。

③ 关于不同历史时期各种社会运动形态的总结，可参考 Charles Tilly, *Social Movement, 1768-2004*, Paradigm Publishers, 2004。

稳定运行，又能够为系统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各国需要通过综合考量，以制度和法律的方式对三方的权利边界和运行方式进行规制，这些规制的总和就是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

基于现实的需要，政府、媒体与学者都会有意地在本国所奉行的政治制度上附加各种价值和情感，用夸张的语言描述选择特定政治制度的必然性，这种行为本身也是巩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环节。但事实上，现存的所有政治制度几乎都是根据本国的实际需要，在不违背维持稳定态结构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差异化安排。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如何选择安置三方利益的重心，有些更倾向于确保政府权力，有些更强调资本利益。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竞争也围绕稳定与发展这两个关键点展开，看哪种模式能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完成维护系统稳定和推动系统发展这两大目标。不同的制度安排与治理方案在获取信息并进行处理、做出决策以及贯彻执行等方面存在优劣。但这种意义上的制度差异与制度竞争实际上仍是在不改变既有结构基础上的执行模式竞争，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对结构本身的冲击不在同一层次上。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科技因素的强大力量将直接作用于主权国家的深层次结构，带来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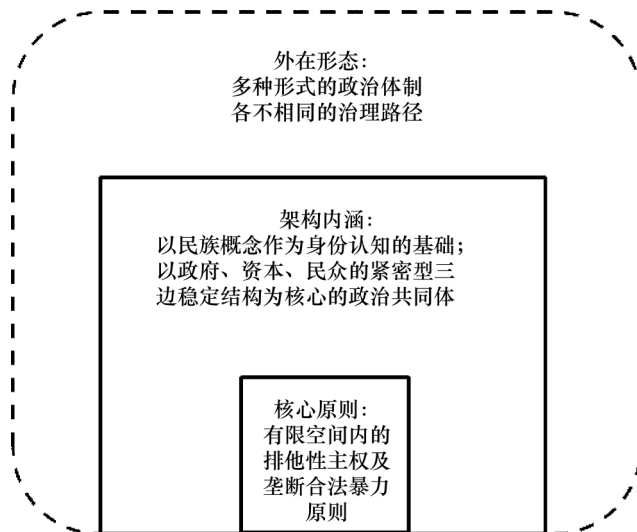


图-2 现代主权国家架构的多层次形态

综上所述，作为当代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共同体，现代主权国家实际上是由多个层次累加而成的系统架构。如图-2 所示，主权国家的核

心基石是有限空间内的绝对主权原则，促使主权国家成为有限空间内“物理暴力的全部正当性的最终来源”。<sup>①</sup> 主权国家通过分割有限的地理空间，实现了对世界政治核心权力的控制，建构了现代国际体系的框架，也决定了国际体系必然是一个由数量不大、法律地位平等，但实际力量差异极大的同质群体构成的无政府体系。具有上述结构与特征的主权国家体系成为目前承载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基础政治架构，人工智能要素在政治领域构成影响的实质就是将其力量直接作用于主权国家结构的不同层次，推动结构变迁的发生，进而构建多元化的未来图景。

### 三、变革的路径：人工智能技术的系统性影响

所有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 GPT）对于社会的影响都是渗透式的，新的技术要素既会直接作用于政治活动，又会以经济社会生活为中介将影响投射于政治体系，所以那些有能力改变社会生产模式的科技进步都会在结构层面留下深刻的印记。<sup>②</sup> 作为这个时代最具潜力的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如果能够持续发展，那么其力量也将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变革的进程起步于主权国家内部结构的调整，最终蔓延到世界政治版图的每一个角落。

人工智能技术跃迁将在主权国家内部创造两种相互影响的变革趋势，即同时形成“主体消解”与“维度创建”进程，从而改变主权国家的既有结构。所谓“主体消解”进程，指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将持续消解“民众”一极在主权国家紧密型三边结构中的地位，造成既有稳定结构的再次失衡。

民众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本质上是由其在经济生产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的，所以民族和民族主义也只有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后才真正展现出不可替代的力量。在现代社会生产体系中，民众既是生产过程中劳动力要素的主要来源，又构成了消费过程中的消费市场，是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核心环节之一。同时，在军事安全方面，民众是军事力量强大与否的关键组成部分。所以在主权国家架构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通过制度性安排和新的社会

---

<sup>①</sup>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62页。

<sup>②</sup> 参考封帅：《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第133—134页。

意识灌输，将更多普通民众从各种形式的等级制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其加入经济生产过程和消费市场的构建，就成为世界发展的宏观趋势，这种趋势在哲学意义上即“人的解放”。<sup>①</sup> 无论是国际层面的非殖民化运动，还是各国国内的妇女解放运动、少数族裔平权运动，本质上都是这种历史趋势在现实层面的反映。<sup>②</sup> 这种力量最终也重塑了现实政治结构，使得民众成为支撑主权国家架构的重要一极，所有政治行为都以更广泛的民众利益作为自己的合理性根源。（参见图-1）

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却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从根本上改变民众要素（或者说人口）在经济体系与军事力量中的地位。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生产领域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以自动化的机器生产取代人类劳动，从而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高效率的生产。<sup>③</sup> 事实上，人类所拥有的技能大体上可以被归纳为两种能力，即身体方面的能力和认知方面的能力。历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各种生产工具使人类能够用更加强大的力量代替自己的身体能力，并完成以往难以做到的事情。但由于认知能力不可取代，人类仍然保持着在生产系统中的独特位置。然而，人工智能技术所探索的恰好是人类在认知领域的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以往只有人类能够完成的分析、判断、决策等过程已经逐渐被证明不再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sup>④</sup> 虽然人工智能在短期内无法像人类一样进行创造性思考，但在日益专业化的社会生产体系中，对于大部分具有较强重复性特征的工作来说，人工智能只需拥有针对特定领域的部分技能就足以将人类挤出现有的岗位，如今我们刚刚迈入弱人工智能时代的门槛，这种风险业已表露无遗。<sup>⑤</sup> 这种状况在军事领域也已初露端倪，由于智能化无人系统的广泛使用，参与战争的实体与指挥战争的决策系统都

---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73—77页。

② 该过程可参考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吴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81—242页。

③ 参见 Martin Ford, *Rise of the Robots: Technology and the Threat of a Jobless Future*, Basic Books, 2015.

④ Jerry Kaplan, *Humans Need Not Apply: A Guide to Wealth and Work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31.

⑤ 相关预测可参考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omation and the Economy”, December 2016, p. 2,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whitehouse.gov/files/documents/Artificial-Intelligence-Automation-Economy.PDF>.

向着无人化与智能化的方向迈进。<sup>①</sup> 如果这种趋势不被人为阻挠或逆转的话，经过较长时间的过渡之后，在新的经济和军事体系中，民众作为一个整体在系统中的价值将持续降低。

“主体消解”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虽然民众端所承载的政治权威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而趋于流散，但除了少部分被资本和政府所吸收之外，大部分权威都将流向一个新崛起的独立政治单位，即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专家群体。专家群体的政治权威来自于技术在社会生产体系中逐步提升的独立作用。凭借在人工智能知识方面的不对称优势，一个小规模的全球性专家群体将获得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巨大影响力，继而崛起为主权国家结构中新的一极。一般来说，专家群体的崛起代表着技术权力在新结构中的兴起，在与资本、政府和民众的互动中以各种方式分享政治权威，能够在多中心、多节点的政治体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独立角色。<sup>②</sup> 主权国家内部也逐渐向更加复杂的结构过渡，体系内的多元维度也将应运而生。

所谓“维度创建”进程，指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跃迁会将一种依赖技术而非其他政治要素存在且能够进行高效决策的新状态引入现有政治架构，从而造成决策过程中效率性与政治性的实质分离，使得世界政治体系由单一维度向“权力分配—决策选项”双重维度演变。

在现有的主权国家架构中，所有最终以“国家利益”为名义的政治决策实际上都是图-1所显示的三方力量在不同环境下的博弈结果，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官僚机构、大型企业与社会舆论作为三方力量的代表，始终为了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政治决策的走向持续拉锯，这些现象构成了当代各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sup>③</sup> 决策是在各方利益的妥协与平衡过程中形成的，这也就意味着政治决策的首要任务是获得结构中各方的共同接受——即使是很勉强的肯定——而不是追求决策的实际效果。换言之，政治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性结果。由于历史进程的单向性与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在大部分情况

---

<sup>①</sup> 关于算法与自主武器对于战争形态的影响，可参考 Peter Layton, “Algorithmic Warfare: Apply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Warfighting”, Report of Air Power Development Center Australia, 2018; Vincent Boulanin and Maaïke Verbruggen, *Mapping the Development of Autonomy in Weapon Systems*,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17。也可参考陈定定、朱启超主编：《人工智能与全球治理》，第209—276页。

<sup>②</sup> 参见封帅：《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第149页。

<sup>③</sup> 参见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曼瑟尔·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下，在决策作出之后就已经无法检验其他路径选择是否更加有效。<sup>①</sup>除了少数重大胜利或失败之外，即便在事后也无法对决策是否最优选择给出一致的意见。因此，在现实政治进程中，这种政治性优先的决策方式是决策者的最佳免责方案，是人类历史经验和智慧积累的结果。

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会在逻辑上对这种传统方案构成挑战。能够模拟人类的认知能力是人工智能不同于以往任何技术进步的关键特征，使得人工智能技术有能力建立起一个更加接近于“独立理性”的决策环节。技术推动的决策进程并非凭空而生，有效的人工智能决策系统的创建和改进本身需要根据某种常数进行设计，这种常数应该是主权国家基于宪法或国家发展的基本目标而制定的，在很大程度上由专家群体对这些价值与目标进行遴选。人工智能决策系统在运作过程中根据技术逻辑进行模拟，通过机器学习或其他方式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算法，最终给出指向原初设定目标的决策结果。虽然仍无法完全摆脱人的因素，但这种决策逻辑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既有决策的核心逻辑。基于技术所提供的决策结果本身并不能确保结构内各方力量都能实现利益妥协，更难以将政治现实中各方那些隐藏在话语背后的目标及很多情感偏好变化纳入考虑，因此，以现有结构的标准来看，这种对政治性的忽视被视为人工智能决策的最大缺陷，也成为很多研究者反对人工智能技术参与政治决策的主要理由。<sup>②</sup>但当我们站在一个更加中立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不难发现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的是另一种政治决策逻辑，即以效率优先取代政治优先，以指向既定的共同体总体利益的算法权力提供更加高效的决策过程。两种不同决策逻辑的张力为政治行为体提供了新的选择空间，新维度也因此主权国家架构中应运而生。

一旦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以“主体消解”和“维度创建”为其标签的变革进程，而两个并行进程的延续也将一步步地促使主权国家的基础结构发生调整。如图-3所示，在人工智能时代，主权国家将逐渐由当前总体

---

<sup>①</sup> 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政治学研究的资深专家就对这种状态进行了归纳：（1）一项正确的决策不能否定可能有另一项决策可以获得更大成功，因为不能重复；（2）一项错误的决策也不能证明另一项方案可能成功，因为在失败之后成功的方案是在一个变化的环境中发生的，环境条件已经完全不同，可比性没有了；（3）决策要求的基本要素不能穷尽，决策基本上是针对未来的，未来是最不能穷尽的。而这种状态也是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集中体现。可参考 Herbert Simon,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4th Edition, The Free Press, 1997。

<sup>②</sup> 例如，Dirk Helbing, et al., “Will Democracy Survive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呈稳定态的三边结构演变为一个四极结构，专家群体作为技术权力的代表与被削弱的民众要素主要在决策维度发挥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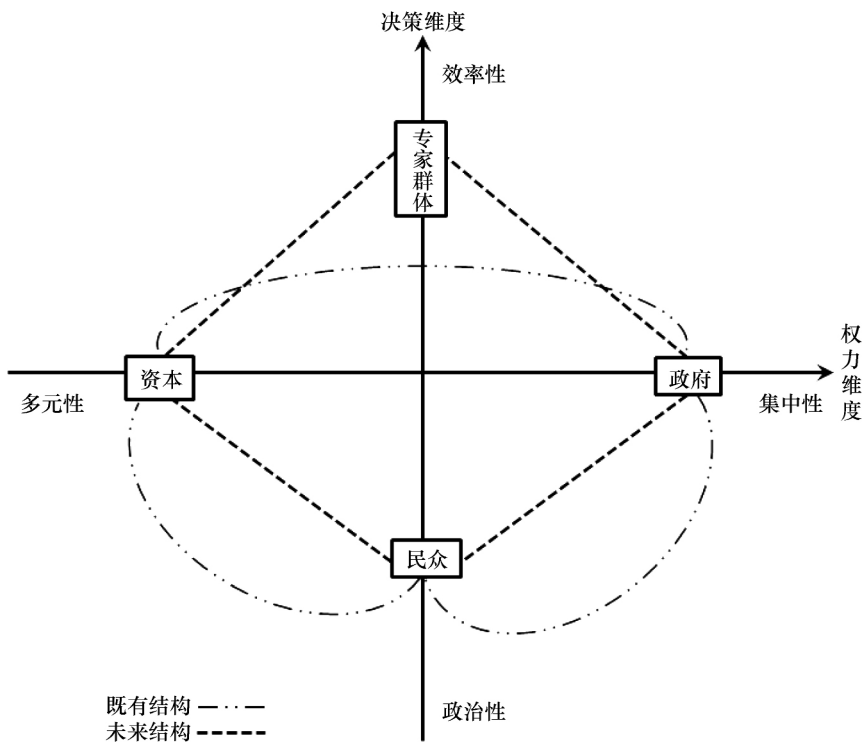


图-3 人工智能时代主权国家结构的变化

图-3 的横轴代表权力维度，政府与资本的两极线性拉锯构成了新结构中权力分配的主要特征。由于民众在经济与军事领域中的价值相对空洞化，其在结构中曾经能够稳定获得的政治权力地位也将逐渐流失。这种状态的外在表现便是算法将人口大规模挤出经济体系，社会财富与分配权力向政府和资本集中，社会与政治的不平等程度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及其衍生技术能够在经济和军事系统中填补民众要素退场所留下的空缺，也就自然会在政治领域中创造代表这种力量的新权力形态——算法权力。<sup>①</sup>然而，算法权力由于无法脱离独立实体而抽象存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构成结构中的独立一极，这部分权力主要将由政府与资本代为持有，专家群体与民众在权力分配

<sup>①</sup> 参见 Taina Bucher, *If... Then: Algorithmic Power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段伟文:《数据智能的算法权力及其边界校勘》,《探索与争鸣》,2018 年第 10 期,第 92—100 页。

方面影响较弱。因此，在主权国家的新结构中，权力维度大体上将由三方关系转变为线性关系，权力集中与权力多元作为这一维度的两个端点，而权力分配的不同逻辑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不同制度设计的起点。

图-3 的纵轴代表决策维度，这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跃迁的出现而在结构内创造的全新维度。在传统体系中，即使政治制度有所差别，但各主体决策过程的实质逻辑是相似的，而且由于其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性特征，基本上依附于特定的权力分配格局。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进步使得决策的政治性与效率性逻辑形成实质性分离。民众要素在权力维度上地位消解，但作为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仍然是政治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客体，甚至在很多研究者看来，如何处理庞大的“无用阶层”在政治体系中的位置将是新阶段政治架构建设的核心问题，所以对于民众意愿的政治性关注被推到了决策维度一端。<sup>①</sup> 而人工智能技术及其与技术相关的专家群体则会凭借强大的效率优势成为政治共同体决策过程中具有重大吸引力的选项。总之，由技术所代表的效率决策倾向与诉诸民众接受度的政治性决策倾向，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政治共同体结构的另一重要维度，决策方案的倾向性选择将与权力分配的选择一起建构政治体系的框架。

新维度的出现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也开辟了世界政治形态变迁的新空间。人工智能及其带动的整个技术领域的进步会带来完全不同的决策场景。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系列技术会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在这一阶段，社会生产、生活的信息传播将以几何级数增长，爆发式增长的数据量在突破某个临界点之后，将会超过人脑所能处理的范畴。所有基于人类讨论而形成决策的模式都将变得低效。<sup>②</sup> 任何希望获得有效决策的政治系统都必须在不同程度上容纳人工智能技术，权力分配方式也需要根据现实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新的政治哲学竞争会在这种环境中出现，围绕着决策模式与权力边界的划分造就未来的各种政治思想流派。<sup>③</sup> 这种争论本身也将伴随着政治共同体的形态演进而持续存在。可以说，人工智能技术

---

<sup>①</sup> 可参考封帅：《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第154页；李晓辉：《如何面对“无用阶层”：人工智能与未来正义》，《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第68—77页。

<sup>②</sup> 尤瓦尔·赫拉利使用“数据主义”这一概念来描述该状态。参见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338—342页。

<sup>③</sup> 参见吴冠军：《竞速统治与后民主政治——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反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6期，第28—36页。

在经济生活领域的改变为其参与政治决策进程创造了条件，而参与政治决策进程又反过来为其自身发展创设了更加合适的环境。它们既亲手搭建舞台，又亲自走到舞台中央，担任这场人类历史的伟大戏剧的主角。这便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通用目的技术的巨大影响——系统性地改变整个世界。<sup>①</sup>

#### 四、变革的结果：世界政治形态演进的多元图景

诚如恩格斯所言，“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于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sup>②</sup>人工智能技术跃迁便是我们这个时代注入旧结构中的那个促使发展进程继续推进的关键要素，它所拥有的独特的影响力模式具有穿透主权国家架构外层、形成直接推进其内部结构变迁的强大力量。结构变迁与维度拓展对于世界政治的发展具有颠覆性的意义，人类社会将在多维结构的基础上重新调整政治共同体的形态，多元异质化主体在多维体系内并存将成为可能。人类社会将迎来一个在政治领域充斥着多元选择的世界，历史也将逐渐步入新的未知之地。

人类对于所有未知都带有本能的恐惧，因此，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渴望以现有的知识与智慧蠡测未来。但未来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有无限的可能性，即便我们能够推断出人工智能时代世界政治中单元与体系的演变路径，也几乎不可能准确分析未来世界的最终形态。因此，对于当代研究者而言，用全景的视角对多种可能出现的情境进行粗线条的描绘，全面铺陈与罗列所有变化的可能性，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系统性认知。

---

<sup>①</sup> 参见 Rainer Andergassen, Franco Nardini and Massimo Ricottilli, “Innovation Diffusion,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and Economic Growth”,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Vol 40, March 2017, pp. 72-80; Vladimir Korzinov and Ivan Savin,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as an Emergent Property”,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129, April 2018, pp. 88-104.

<sup>②</sup>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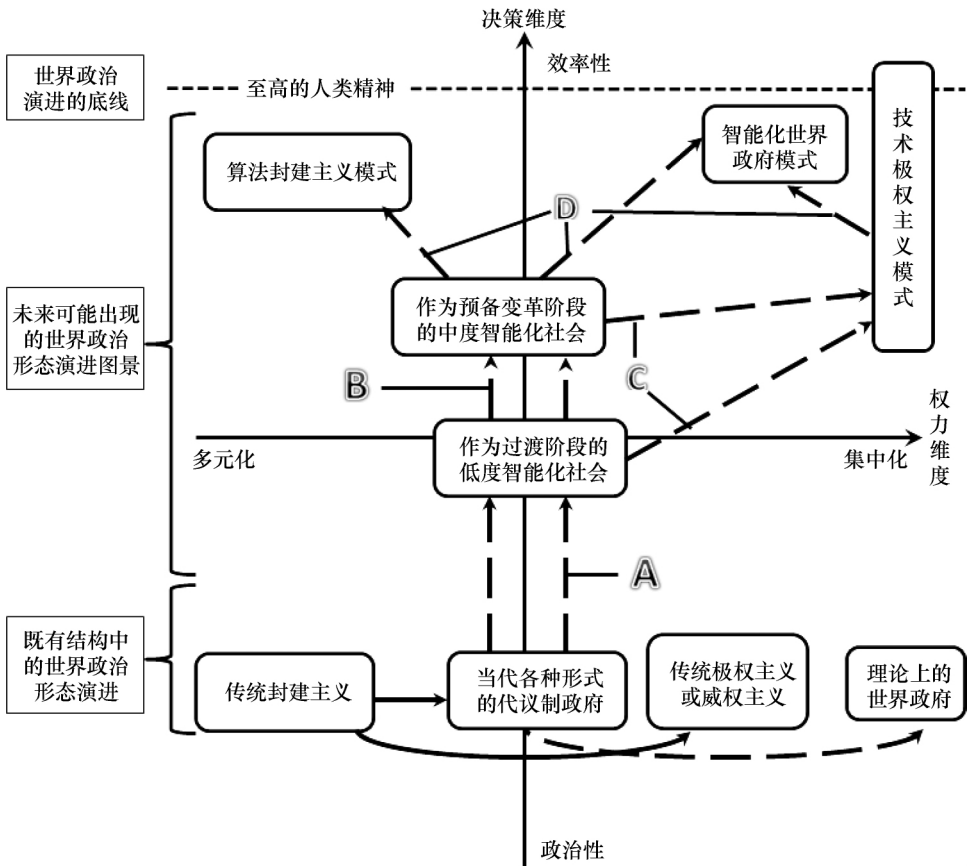


图-4 人工智能时代世界政治的形态演进图谱

概括而言，图-4 所展示的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可能出现的世界政治演进形态，我们所熟悉的现代主权国家体系是整个演进过程的起点，而能够影响演进方向的力量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及其所带来的科技革命是变革的发动机。作为迄今人类社会所发明的最具适应性的政治架构，主权国家架构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在可变条件仅有权力维度的情况下，除了位于权力分配两极的传统封建主义和理论上的世界政府之外，几乎所有权力分配方式都可以在既有的主权国家体系内得以实现，这种状态也将世界政治的形态演变限制在单一维度内。<sup>①</sup> 因此，只有当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达

<sup>①</sup> 关于主权国家架构与其他政治形态的对比，可参考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orld History: Remar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到相当的高度，能够实质上改变整个世界经济运行方式，瓦解传统的三边稳定结构并引入新维度，才能够使整个体系获得新的演化空间。人工智能技术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与规律，在科研基础较好、市场规模较大、数据资源较为丰富的环境中能够自然成长。我们可以对其进行预测和观察，但无法提前对它所引发的科技革命的时间与方式进行规划。正是由于科技发展存在多元可能性，给世界政治形态演进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第二，无政府状态的存废选择是塑造世界政治形态的重要因素。无政府状态是主权国家体系的基本特征，也是以主权原则塑造世界的逻辑结果。由于主权国家体系的巨大包容性，无政府状态作为一种普遍的国际背景会长期与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的社会变革相伴而行。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会限制行为体的选择空间，主体间普遍存在竞争关系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可能成为新技术研发推广的重要助力，但也有可能使行为体在激烈对抗环境下做出非理性决策。是否能够在体系层面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则将会成为影响世界政治形态演变的关键抉择。

第三，人类精神是一切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底线。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人类会不断逼近客观世界的终极认知，向着哲学意义上的自由王国飞跃。<sup>①</sup>但人类社会的建构是有底线的，这条底线就是不可逾越的人类精神。任何关于人类社会形态的思考都是建立在抽象的人类精神基础上的，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所有的社会建构都要维护作为整体的人类利益。社会建构的终极价值是人本身，一切社会形态都不能够违背这个基础逻辑，即不能对人类整体构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不能将其他任何利益置于作为整体的人类利益之上。在科技进步不断加速的未来世界中，强调至高的人类精神将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的前提，因为有了人类精神也就没有了社会本身。这种底线思维构成了我们推导世界政治演进过程的一个重要条件。

以上三个方面的力量实际上限定了人工智能时代世界政治形态演变的基本空间，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政治从单元到体系都会逐步加入这一历史进程，这一长时段变革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效能的逐步释放形成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逐次展现出多种可能的政治形态。

#### （一）A 阶段：作为过渡阶段的低度智能化社会

在人工智能技术开始在政治领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之后，人类社会

---

<sup>①</sup>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06—307页。

向智能化社会的过渡实际上就已悄然开始，而主权国家内部与整个世界政治形态也会发生微妙的改变。

一方面，所有代议制政治体制都会由于经济系统中民众地位的削弱开始呈现出权力的实际掌控与权力的制度性安排不匹配的现象。能够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组织或个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绕过制度设计的原初目标，实现对自己有利的政治结果。类似“剑桥分析”这样的案例将会越来越普遍地在代议制国家中出现，而且会在较短时间内以更加高级、更加隐蔽的形式加强对民众意志的引导和操纵。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项新的辅助工具，将逐渐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进程。在深度学习或其他弱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阶段，人工智能技术无法实现对于人类决策的完全模仿，但它能够更加迅速且完整地搜集信息、模拟场景、评估利弊，并提供有参考价值的决策建议，这种强大的决策辅助能力是任何理性的政治家都不会忽视的。<sup>①</sup>人工智能技术将以其强大的工具属性逐步嵌入政治决策进程，当然，这种参与将是有限的，而且在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会相对较低。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段正是 A 阶段早期，当前学术界围绕人工智能现实影响的各种讨论也正是对既有变迁趋势的回应。基于对未知的恐惧，很多学者和思想家都提出对人工智能技术在政治决策领域的应用进行限制的构想。然而，在体系层面仍处于典型的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间普遍存在的竞争关系便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正向动力。只要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足够强大，主要世界大国为了避免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竞争中陷入劣势，就无法为了某些抽象价值而舍弃对技术现实价值的追求，于是，逐步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也就会在全球经济与政治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推动政治共同体及国际体系沿着决策维度向效率性一端推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化，人类将逐渐进入低度智能化社会。主权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基本形态总体上仍将维持原状，但技术力量的广泛使用会逐步掏空代议制政治体制的实质意义，不断削弱这一类型体制的威望。于是，很多代议制政治体制在保持现有的外在形式的情况下，权力的实际分配会更加接近现实力量结构的对比状态，主权国家之间的竞合博弈也将继续成为世界政治的主要内容。这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直到人工

---

<sup>①</sup> 参见封帅、周亦奇：《人工智能时代战略行为的模式变迁——走向数据与算法的竞争》，第 34—59 页。

智能进化到较高级别，技术主导的效率决策方式与人类的政治性决策方式在能力与应用方面达到相对平衡状态，政治领域的变革进程才会进入实质性阶段。

## （二）B阶段：作为预备变革阶段的中度智能化社会

从B阶段开始，世界政治的演变就逐渐超出了人类社会既有经验的范畴。在单元层面上，从这一阶段开始我们已经很难套用希腊时代就已经出现的“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共和制”等概念为新的政治制度打上标签。<sup>①</sup>人工智能系统在国家决策体系中的位置逐步超越传统决策模式，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主导政治行为体的政策选择。而在体系层面，围绕技术效能、价值理念与体系原则的三难选择开始出现，从而决定了未来世界政治的路径分歧。

B阶段出现的标志有二：一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进步，使其在政治决策环节展现出明显的效能优势。二是人工智能技术深刻地嵌入经济与社会生活之中，普通民众逐渐接受甚至依赖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生活方式。其主要表现为，人类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开始逐渐接受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导，一步步熟悉人工智能系统以建议的方式对于社会生活的规划，进而将更多的选择权交付算法来执行，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建立起对于技术与算法主导地位的合理性认知。在技术能力提升与无政府状态的共同作用下，主权国家内部将会越来越通过制度性安排，将更多的责任交予人工智能技术来执行，赋予其更大的政治权威。但从人类以往的历史经验推断，在逐步走入中度智能化社会的过程中，由于制度惯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政治领域的变革往往会滞后于经济层面的变革。而且，如何通过制度性安排释放新技术的影响力也存在很多现实和思想层面的争议。所以，B阶段将是一个由传统模式向新时代逐步推进的转折阶段，各种深层次的结构调整渐次发生，主权国家与世界政治形态的演变进程也将迎来新一轮“路线”之争。

这种路径竞争源自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影响力高速膨胀造成全球体系内政治、经济领域制度调整的不均衡状态。在主权国家架构及其所创造的全球

---

<sup>①</sup> 事实上，迄今我们对于当前政治制度的讨论并未完全超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所形成的框架，即按照权力分配方式来标记政治制度。这也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始终沿着单一维度演变，直到新技术所带来的新维度被纳入体系之后，原有的制度构建路径才可能发生变化。参见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无政府状态中，人工智能技术力量的充分释放与人类价值观继续主导政治系统这两项目标已经无法同时实现，所有在无政府体系内的国际行为体都需要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否则就需要尝试推动无政府状态的调整。换言之，在中度智能化社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政治领域形成了一组“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sup>①</sup> 在该情境下，传统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人类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现实效用三者仅能得其二（图-5），这样在理论上会出现三种可能的发展前景。当然，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将给经济社会发展 and 政治进程带来巨大的可见收益，放弃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退回到技术变革之前的政治安排几乎没有可行性。因此，实质上具有参考价值的发展方向共有两个，即人工智能技术与另外两种要素的组合结果，它们也就构成了下一阶段世界政治形态变革的总体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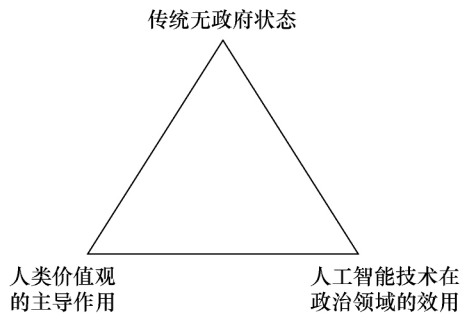


图-5 中度智能化社会中政治系统的“不可能三角”

### （三）C 阶段：技术极权主义模式的歧路

历史的发展进程往往充满了歧路，在“不可能三角”状态形成之后，一种具有较大风险的政治架构在理论上很有可能出现，这便是技术极权主义模式。

技术极权主义模式的实质是在“不可能三角”关系中选择保留无政府状态与人工智能技术两大要素作为搭建新的政治架构的基础，通过牺牲人类价值观在政治架构中的地位，以权力极端集中于智能化系统的方式实现最高的效率目标。

技术极权主义模式是一种激进的政治选择，它最大的风险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这种模式会造成权力的过分集中，在政治共同体内部缺少制衡，一旦衍生到整个国际体系中就会造成行为体对立关系的极端尖锐化；其二是

<sup>①</sup> 关于“不可能三角”的基本论述，可参考 Paul Krugman, “O Canada: A Neglected Nation Gets Its Nobel”, Slate, October 19, 1999, <https://slate.com/business/1999/10/o-canada.html>.

这种模式放弃了由人类主导政治活动这一原则的牵制，在极端情况下有可能逾越人类精神的底线，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风险（参见图-4）。正因如此，技术极权主义模式建立的可能性在人工智能技术诞生之初就获得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本轮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周期内，对于技术极权主义体制的忧虑也贯穿始终。<sup>①</sup>

其实，技术极权主义模式本身存在严重的内在逻辑悖论。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时代，自动化技术的广泛使用造就了庞大的“无用阶层”，所有合理稳定的政治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如何安置庞大的经济与军事意义较低的人群，以某种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进行人群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不稳定三角”中抛弃人类价值观的做法将使政治架构建设缺乏稳定的支撑，在世界政治单元层面就很难实现。另一方面，在技术极权主义模式中，人本身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和可取代的，且威望与算法体系相比严重不足，克里斯玛型权威很难形成。<sup>②</sup>因此，技术极权主义模式很难推广成为整个国际体系普遍的现实状态，即使个别主权国家展现出这种变迁趋势，也很容易受到其他行为体的排斥与抵制。总而言之，技术极权主义模式的出现需要特别苛刻的内外条件。

条件一，在世界总体上进入中度智能化社会之后，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爆发极为激烈且广泛的国家间竞争或冲突。在各国力量相对接近的情况下，为追求严酷竞争中的相对优势，有可能选择最大限度地释放人工智能技术能力，为此牺牲其他方面的原则。条件二，政府与资本能够在激烈竞争的条件下实现以政府权力为核心的充分整合。即资本能够接受权力向政府方面集中，并充分调动资本所掌握的算法权力支持政府在新的政治体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只有当这两项原则被同时满足，且在与其他制度的竞争中取得明显优势，技术极权主义才会作为一种获得普遍接受的政治形态出现在世界政治形态变迁的谱系中，从而构成形态变革的C阶段。在个别极端情况下，也不排除从低度智能化社会直接演变的可能性，但由于技术极权主义本身存在的逻辑悖论，它很难构成一种长期稳定的政治生态。

---

<sup>①</sup> 几乎所有的人工智能研究者都对技术极权主义体制的出现保持警惕，笔者也持同样的态度。类似观点可参考 Hamid Akin Ünv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Systems”, pp. 4-8; Daniel Aray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End of Government”。

<sup>②</sup> 关于克里斯玛型领袖的相关论述，可参考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下册，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19—1581页。

#### （四）D 阶段：超越无政府状态的多元路径

虽然存在技术极权主义等非主流形态出现的可能，但“不可能三角”状态所带来的最大可能性仍然在于推动新时代世界政治超越无政府状态的限制。从根本上说，政治生活的本质就是在不同人群之间进行权力和利益的分配，通过制度体系安置人与他人、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相互关系。因此，人类社会在任何时代的政治安排都离不开某种符合时代需求的核心理念与价值观，否则政治安排便会失去意识形态层面的基础。然而，既然人类价值观与人工智能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都对人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要同时满足这两个目标，那么传统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就可以成为“不可能三角”中那个被放弃的唯一选项。在新的底层逻辑基础上构建世界政治的单元与体系形态将成为人类社会变革进程的关键。

如图-4 所示，超越无政府的路径是多元的，同时存在以权力相对集中为特征的智能化世界政府与以权力高度分散为特征的算法封建主义两条潜在的发展路径，它们分别代表着政府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演变进程。二者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解决“不可能三角”给政治构建带来的逻辑困境，但所选取的突破口各有不同，从而构成了发展方向多元化特征明显的 D 阶段。

其一，算法封建主义路径实质上是要打破主权国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造就一个主体多元、权威重叠、趋于自治的原初状态，进而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重新比较与磨合，最终实现人工智能时代较为合理的政治安排。<sup>①</sup>

该路径的形成也需具备一些特定的条件。一方面需要资本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获得更大且难以取代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迫使政府放弃对于最高权威的垄断，承认超大型企业或其他资本力量的组织形式同样具有平等的国际行为体地位，进而将这种承认扩大到科学家共同体等其他非资本性独立组织。另一方面则需要与地理空间联系弱化的经济生产方式逐渐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在地理空间权力价值削弱的情况下，任何行为体都无需强调对于地理空间的绝对掌控，主权概念的内涵与主权国家的外在表现形式才会发生明显变化，以其他逻辑划分权力边界。算法封建主义路径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本身拥有更加强大的力量，独立个体或小型组织的自主性得到有效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依赖于超大型政治组织而生存的能力。

---

<sup>①</sup> 参见封帅：《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第 146—148 页。但笔者通过后续研究，认识有所深化。算法封建主义本身并非必然出现，它的形成和稳定都需要特定的条件。因此，它是未来政治共同体架构发展的一种可能前景，但是否是最优选项尚需进一步讨论。

在算法封建主义模式下，经历变革后的主权国家、城市、大型企业、科学家共同体、各种专业性组织，以及我们当下无法想象的各种形式的独立机构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以相对平等的方式实现互动，分享政治权力，承担社会义务，造就一个合作与竞争状态更为复杂、但能更好容纳人工智能技术力量的全球体系。

其二，智能化世界政府路径的实质则是要通过世界政府的建立消解主权国家架构所带来的无政府状态，使人工智能技术的力量与人类价值观在一个非对抗环境下完成适度妥协，从体系层面自上而下地完成新的政治建构。<sup>①</sup>

该路径的形成也需要一些特定条件：一是政府在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新的权力分配中获得更大的份额，对于算法与数据的垄断使政府成为新结构内唯一具有承担重构世界政治体系能力的主体。二是人工智能技术潜力的持续释放推动全球在经济、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等领域存在较高程度共识，技术因素在时间的帮助下弥平了历史与思想的鸿沟，使整个人类社会无限趋近于“普遍均质国家”。<sup>②</sup>具备这些条件，即使历史发展拐入技术极权主义支流，也有回归智能化世界政府的可能。

作为一种理论模型，智能化世界政府并非是现有的主权国家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简单复制，而是人工智能技术力量完成政治与社会心理塑造后的变革结果。在智能化世界政府模式中，主权将以不同方式突破现有的分割式地理空间的限制，使全球地理空间在某种新的理念和框架中被整合为同一政治空间，自然消解无政府状态。新的全球政治空间将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在全球共识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能够同时满足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人类价值观的政治架构。由于智能化世界政府模型本身是在共识与非对抗背景下形成的，那么它的对内制度安排一定是开放与包容的，在统一政治空间中接纳多元行为体共存，以某种制度形式保证其政治义务与权利的充分实现。从这一点来看，智能化世界政府模式虽然在外在形式上与技术极权主义好像有相似之处，但在内在精神方面却明显更接近算法封建主义，这也是本文划分 C、D

---

<sup>①</sup> 建立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政府是目前全球研究者和民间团体对于未来政治制度建设重点讨论方向，也寄托了很多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想象。斯蒂芬·霍金生前就主张以世界政府的形式发展人工智能。参见 Ellen Powell, “Stephen Hawking Calls for ‘World Government’ to Stop a Robot Uprising”,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9, 2017, <https://www.csmonitor.com/Science/2017/0309/Stephen-Hawking-calls-for-world-government-to-stop-a-robot-uprising>.

<sup>②</sup> 关于“普遍均质国家”的理论内涵，可参考科耶夫：《法权现象学纲要》，邱立波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两个阶段的主要标准。

当然，现实中的各种变化远比理论模型推演更复杂，世界政治的重构路径是多元的，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权力在政府与资本之间重新配置的无数种可能性会造就一个开放的未来图景。我们在这里分析和展示的算法封建主义与智能化世界政府更像是这种变革维度的两种理想状态，而现实中的情境则更有可能兼而有之，以更加平衡或者更加波折的方式实现政治共同体的重建，以告别传统无政府状态为标志重构世界政治版图。

综上所述，从图-4 中的 A 阶段到 D 阶段，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发展周期内，人工智能技术影响力的持续释放将推动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态持续演进，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展现出多种可能的发展路径和各种不同的未来图景。这种变革进程根源于科技革命，因为任何现存的政治架构都有其效用边界，但革命性技术所带来的影响却会随着技术力量的不断提升而持续增长。当旧的政治单元与全球架构无法有效安置系统内新要素的时候，变革的发生就不可逆转。

政治领域的变革进程在起步阶段将是涓滴式的，很多能够影响政治活动的重要智能技术最初可能会被运用于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决策中，随后可能会在新加坡、以色列等拥有较高技术能力、但领土和人口规模较小的政治体中获得认可。低度智能化社会将是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只有当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社会与新技术的相互适应都达到较高程度后，世界政治才有可能进入对底层政治规则进行修改的深度变革周期。在不突破人类精神这一基本底线的情况下，在算法封建主义、智能化世界政府或其他折中政治安排之间如何抉择，只有未来的历史才能给我们答案。

世界政治的演进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很多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政治要素都有可能在某一时刻消亡，而我们唯一能够肯定将延续下去的，只有人类基本的理性原则与永不止步的科学精神。在此基础上，任何能够既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需要，并为技术进步创造条件，又能够建立合理的价值观标准，保证民众生存与发展权利的自治性政治安排都可能成为未来世界政治形态的组成部分。恰如恩格斯所说，“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sup>①</sup>

---

<sup>①</sup>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8页。

## 结语：从民族国家体系走向全球秩序

无论切入点如何选择，我们当下所有围绕人工智能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实质上都是基于已有的经验和理论去思考并建构未来世界。

时至今日，人工智能技术的潜能仅露出冰山一角，人类社会也刚刚临近人工智能时代的门槛，用现有的知识与思想去分析和展望未来政治架构的走向及其社会影响，我们便很难完全摆脱时代的桎梏。然而，这一议题的重要价值又让所有研究者无法退却，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是将某种具有巨大力量的全新变量纳入政治架构而引发的重新设计，是可能改变“政治”的基本概念，使之从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分配演绎为重新划定人类价值与技术价值边界，从而建构新的全球秩序的重大议题。更为重要的是，所有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特征及政治共同体建构的阐释和辩论最终都会作用于社会进程本身，那些或深刻或浅显的理论认知都有可能对时代发展轨迹产生微妙的干扰。我们今日围绕人工智能议题所做的研究不仅仅是在解释世界，更是在改变世界。

虽然无法从历史经验中找到模板，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跃迁将会重新定义世界政治的范畴与内涵，推动我们所处的世界逐渐走出民族国家体系的桎梏，迎来新的全球秩序。

首先，在单元层次上，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秩序将由单一走向多元。以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将不再是世界政治舞台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行为体，政治权威将会分散到形态各异、规模不等但能够在不同领域或议题上充当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各种组织之中。与之相应，“民族”概念也将不再是政治共同体整合的主导性诉求，在思想层面对于人类精神和价值观的系统性阐述都有可能为其他性质的行为主体提供人群整合的核心理念。无论最终世界政治呈现出怎样的未来图景，人类社会整体上必将迎来一个趋于多元化的全球秩序。

其次，在互动方式上，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秩序将由简单走向复杂。异质性多元行为体对世界政治的直接参与，将使全球秩序的内容变得格外丰富。全球范围内主体间的互动不再局限于竞争、合作与对抗等单一维度，也很难以传统方式衡量主体间的权力分配。行为体之间的性质差异将创造出很

多深嵌于全球秩序中的功能性领域，不同领域效能的发挥支撑着全球秩序的运转。虽然行为体仍然会因为所处的位置及发挥的功能而获得不同水平的系统影响力，相互之间也仍然会存在冲突，但在领域分割的条件下，行为体之间将形成更为复杂的协同、干扰、制约、取代等关系，以不同的互动方式实现全球秩序的维持与发展。

最后，在体系层面，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秩序将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扬弃。人工智能时代政治层面的所有变革都指向一个核心目标，即充分释放人工智能技术的经济与政治效能。然而，所有理性的政治设计也蕴含着一个刚性的限制条件，即不能够突破人类精神的底线。在两方面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传统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就成为体系重构过程中必须进行修订的底层逻辑。人工智能技术并非不能在无政府状态中实现高速发展，而是因为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深度结合将会给人类整体利益带来不可预知的制度性风险，因此，推动无政府状态的调整将是全球秩序变革过程中的重要任务。

归根结底，“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时代的需要”，<sup>①</sup> 科技革命是所有经济生产形式与政治社会形态变革的根本动力，随着生产方式的更新，无论民族国家体系拥有多么坚实的内核，也必然随之发生内部结构和外部形态的改变，从而走进建构人工智能时代全球秩序的伟大历史进程。身为变革时代的研究者，我们同样也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我们从来不是消极观察和默然等待体系更迭的完成，我们所做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借助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参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秩序构建，在漫长且波折的变革进程中坚守人类精神的底线。也许随着时间的洗礼，我们现在所提出的绝大部分观点最终都将被淘汰，但在大浪淘沙之后，最终能够保留下来的思想精华就会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根基。我们所做的每一项严谨而有创见的研究都是变革时代的精神财富，探索人工智能时代的过程就是在建构我们自己的未来。

（责任编辑：李 丹）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现实基础》，载《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91页。

has strengthene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WHO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provided medical and health assistance 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Africa. EU pandemic governance manifests the unique nature of integration model, that is, clear and pragmatic allocation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ies to avoid governance dilemma,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ance as a result of varying situations in different areas, plural governance actors trying to maintain a balanced relationship, and reliance on normative power to upgrade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soft power. Different from the “strong nationalism” where a state mobilizes national strength to curb the spread of the pandemic and the “weak nationalism” where a state is constrained by domestic politics and takes the guarantee of normal economic activities as the premise, the European Union explores a third way based on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EU’s pandemic governance highlights the European model’s resilience of internal unity and external strength.

**Key words:** EU health governance,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COVID-19 pandemic, European model

## **From Nation—State to Global Order: The Vision of Worl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ENG Shuai*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caused by it will have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life of human society. It can not only impact the existing political systems in varying degrees, but also gradually change various key elements in the sovereign state struc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release of its influence.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elements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dimension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will open up a new space for the morphological replacement of world politic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the world will generally go through four stages of political evolution. After the transition of a low-intelligence society, the world political system will gradually surpass the existing human cognition of politics in the moderately intelligent society. Rational human society needs even high human spirit as the bottom line when choosing political form. Therefore, the technological totalitarianism model characterized by the deep combination of anarch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will be a major risk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After the technical leve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ideological cognition of human society are more mature, a more stable world political form can take shape between algorithmic feudalism and in-



telligent world governmen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will redefine the connot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d eventually promote a new global order.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orld politics, technological totalitarianism, algorithmic feudalism, intelligent world government, nation-state, global order

## **Transcending the “West—East” Dichotomy: On the Self—binding and Emancipation of the Studies on Ancient East Asian Orders**

*CHEN Zheng*

**Abstract:**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based on ancient East Asian historical experiences, especially the workings of the so-called “tribute order”,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recent years. The rise of this academic agenda is a response to both changing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intensifying academic competitions. A review of four representative work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including discussions those works have stimulated, reveals several contradictions that have arisen in their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reception process. As far as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are concerned, most of those works come with an underlying tension between their universalist and particularist inspirations, either exaggerating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East Asia and the West in particular, or ignoring the space for expanding theoretical scope beyond East Asian experiences. In terms of policy thinking, as far as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of the East Asian region is concerned, neither “tribute” nor “hegemony” is in line with basic principles of China’s diplomacy. They are of limited value for policy inspiration, and may even become a discourse trap for Beijing. As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order in ancient East Asia is very complex, scholars should “rescue” history from the “tribute paradigm” and pay full attention to experiences that go beyond the “tribute system” or “Chinese hegemony” paradigm so as to make serious and systemic historical comparisons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Scholars should transcend the “East-West” dichotomy and break through the self-restraint imposed by the aforementioned dual-intentions. They should also guard against all forms of self-centered prejudice and promote dialogue and mutual appreciation actively so as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constructing a pluralistic and inclusive East Asian order through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based on/beyond East Asian experiences.

**Key words:** tribute order, East Asian order, Chinese diplomacy, exceptionalism, hierarchy, historical comparison, hegemony

(译审: 魏 玲)